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百岁老兵的军礼

10月22日,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。百岁老兵陈大国坐在电视机前,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的新闻播出,老人缓缓举起右手,敬了一个军礼。

第一次敬军礼时,他还是个娃娃。90多年前他跟随红军走过草地时,战友们叫他“红小鬼”。后来,他因母亲病重,不得不告别长征队伍;再后来,当鸭绿江畔的炮声传来,他咬破手指写下血书,请战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

陈大国小时候家里穷。红军来到川东后,父亲陈相山参加革命,为红军带路、筹集物资,1933年被反动民团杀害;二哥陈大海也在革命工作中牺牲。红军干部提醒,留下来可能遭到报复。

就这样,母亲胡先群带着一家五口,跟随红军队伍离开了家。

当时的陈大国个子小,方便执行任务。他记得,自己曾装成讨饭的孩子,穿着破衣服,挎着破包,去竹儿观、白沙河一带侦察敌情。他四处转悠,记下驻军人数和机枪、小炮等武器装备,再回来向红军报告。那时,他才七八岁。

“根本不懂怕。”陈大国回忆,那时虽然不懂多少大道理,却知道红军待穷苦百姓好,有人没饭吃,就把饭分给他们。

他还记得,当年队伍里有人讲起将来的日子:“等将来革命胜利了,该读书的读书,该工作就工作,吃的穿的都有了……”对这个孩子来说,那是他盼望着的生活。

1935年,陈大国跟着队伍开始长征,翻山越岭,走进茫茫草地。粮食越来越少,饥饿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事。他记得吃过少量被称作“耗牛面”的食物,也挖过野菜、草根充饥。

一家人的日子尤其艰难。长征途中,嫂子生下一个孩子,孩子没能活下来。随后母亲胡先群又病倒了,她腹部



百岁老兵陈大国收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新闻时,主动起身敬礼。
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肿胀,无法行走。

队伍还要继续前进,病重的母亲却再也难以支撑。陈大国记得,红军干部与陈家商量,能否让部分家人返回。哥哥陈大林舍不得离开队伍,提出自己和弟弟继续跟红军走,让母亲、妻子和妹妹先回去。

但母亲胡先群却不答应。已经失去丈夫、儿子,又在长征途中失去孙辈,她不能接受剩下的两个儿子再离开自己。

最终,陈家五口人告别红军,踏上返乡的路。临别前,红军给陈家开具了一张证明,记载陈相山为革命牺牲,以及一家人参加革命的经历,并叮嘱兄弟俩妥善保管,等到革命胜利再去当地政府报到。

胡先群把证明折了又折,塞进一件

破旧棉袄的棉絮里,又在外面上打几块补丁。

回乡后,一家人仍要躲避追捕。此后十多年,陈大国讨过饭、干过苦力,也在川东的江河上拉过纤,从宣汉一路辗转到合川。红军队伍早已走远,那张缝在旧棉袄里的证明,却始终跟着这一家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宣汉当地登记曾参加红军的人员。胡先群拿出保存十多年的旧棉袄,拆开针脚,取出了那张证明。

1950年,抗美援朝战争打响。次年,前线需要补充兵员的消息传到宣汉。已在地方武装服役的陈大国毫不犹豫:我报名!

“没能走完长征,我心里很有遗憾。”陈大国说。他写下请战申请,咬

破手指,用鲜血签上自己的名字。母亲病重时,他无法选择继续长征;这一次,面对生死未卜的战场,他自己作出了选择。

未竟的远征,再出发。

从宣汉一路步行到万县,再乘船、转车北上,陈大国随部队跨过鸭绿江。入朝时,大家唱着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他回忆,自己所在的是志愿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三团,曾承担团部警卫员。

在朝鲜战场,他承担过团部警卫任务。七十多年后,说起一次炸桥行动,老人仍会站起身来比画:夜里,战士们攀着绳索爬上陡峭的山崖,摸向敌军守卫的桥梁。天将亮时,战斗打响,桥被炸断,敌军车辆无法通行。

战斗结束后,团长让他找些吃的。他翻过几辆卡车,最后用刺刀挑开一辆吉普车的坐垫,找到藏在下面的牛肉罐头。几十年过去,这些细节他仍记得清楚。

另一次行军途中,敌机投下炸弹。一块弹片迎面飞来,擦过他的头部,连棉帽也被击中。“弹片如果再深一点,就牺牲了!”他说。

退伍后,陈大国回乡从事航运工作。过去,他在川东的江河上拉纤谋生,肩上勒着纤绳;后来,他参与河道疏浚、船舶运输。船来船往,还是那片熟悉的江河,他成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者。

“现在个个有饭吃、个个有衣穿、个个有钱花。”说起今天的生活,陈大国最感慨的仍是这些寻常事。

长征队伍里那些曾分给穷人饭吃、向孩子讲起未来的人,许多没能看见今天。陈大国还记得他们,也记得他们盼过什么。

“如果他们活到今天,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。”陈大国说。

新华社记者 卢宥伊
(新华社成都10月26日电)

此去杳杳,见字如面——红军家书里的守望

1934年秋,于都河畔秋风萧瑟。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此,踏上长征。没有人知道前路几许,归期几何。那些穿越烽火的家书,是信仰的回响,是亲人间最真挚的牵绊。

“革命不成功,我不回家,成功之日见。”

写下这句话的人叫李骏,红三军团指挥员。部队集结于都时,他的家就在渡口附近的塘头村,师长特意批假让他回去告别,他谢绝了:部队即刻开拔,指挥岗位不能离人。

就着一盏马灯的微光,他给妻子钟华英写下家书:“我已远征而去。何日返乡,无可料之。望妻上尊高堂,下抚孩儿,替我尽孝尽责。我已立志革命,而现革命尚未成功,我必将继续为之。”

寥寥数语,盛着一个儿子、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压在纸背的愧疚,和一个革命者不肯回头的决绝。

三个月后,长征途中的青杠坡战斗打响,李骏率突击营杀向敌阵,中弹牺牲。那封短信,成了绝笔。

家书里,有以身许国的忠诚本色。周吉可,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,同年秋不幸牺牲于川西长征途中。

他曾在家书中写道:“希望你们相信,我有我的伟大的事业”“请你们原谅我,以后我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。现在总是不能回家,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,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寄来,有书信往还,反转令你们对我倍加怀念。”

家书里,有热血青年的思乡之情。“你双亲大人不要挂念我,能要保重你自己身体,对于家中一切事务要你双亲大人调理”“我在前方粉碎敌人五次‘围剿’,保障分田胜利”“我又开转于都县,希你接信后马上回音前来”……

这是肖瑞廷写给父母的家书。他所在的红五军团34师,被称作长征途中的“绝命后卫师”。为了保护主力部队的安全,湘江一战,六千多名将士几乎尽数牺牲。

家书里,有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。“叔振同志: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,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。你不要伤心,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,不要脱离革命战线,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、豹、熊三幼儿成人,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……我葬在大余海关附近。十二时快到了,就要上杀场,不能再写了,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!”

这是1935年3月刘伯坚英勇就义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。可惜的是,他的妻子王叔振已牺牲于闽西游击区,没能看到这封动人心魄的信。

家书里,有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。“在那白色恐怖的恶劣动荡年头,为了抢救我这个红军战士,您们把自己的生死、安危置之度外……三餐茶饭,敷洗伤口,无所不周,胜似骨肉血亲,真是我再生的父母。”

在长征途中,福建籍红军战士黄万先身负重伤掉队。当地村民张先安、张志贤父子发现了,并不顾生命危险将其救下。

死里逃生的黄万先,一生都记挂着救命恩人。1965年,黄万先和张家取得了联系。在此后的20多年里,他给张家人寄了十封书信,字字皆是肺腑感恩。寄信时他会附上邮票,方便老乡回信时无需再自己购买。临终的时候,还要把他毕生存下的150块钱寄给张家人。

家书里,有跃然纸上的浩然正气。1937年4月10日,身在延安的高捷成致信宗叔,回望离别家乡六年的艰难:“在这六年中东西奔波,南北追逐,历尽一切千辛万苦,雪山草地,万里长

征,在所不辞!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!志向所趋,海浪风波在所难阻!”

他始终牢记当年欠下银庄的债务,在家书中郑重承诺:“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,时刻纪念在心,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。国家得救,民族得存,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。”将个人信义与民族大义融为一体,这是革命者的责任与担当。

家书里,有鼓舞人心的必胜信念。红军战士熊启文于1935年3月给父母以及么叔写信报平安。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:“现在革命正为高涨,东打西征,南讨北伐,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,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抗。”

信仰最动人的样子,是一个战士在最艰难的时刻,始终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与胜利的一边。

纸短情长,映照民族危亡之际无数鲜活个体的人生境遇、使命抉择,让人无法不为那些衷肠倾诉而动容,无法不被伟大精神所感染。

当于都河水不再呜咽,焦土重新覆上新绿,山风里是炊烟……亲爱的战士们,此去杳杳,我们见字如面。

新华社记者 董博婷